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a's
Translation Study: 1981-2003

中国新时期
翻译研究考察：
1981—2003

■ 李林波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

1981 — 2003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a's Translation Study: 1981-2003

李林波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1981—2003年期间中国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主要基于这一阶段内发表于中国大陆的翻译研究文献,包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以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事件。在内容上侧重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考察,主要论题包括我国翻译界在西方译论引进、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多元局势以及翻译学科建设方面的基本事实和发展状况。这几项内容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大系统。本书首先对以上各部分的发展情况做实证性的梳理和总结,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做出考察,以此来显示出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同时为中国翻译学将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李林波著.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612-2303-1

I. 中… II. 李… III. 翻译—研究—中国—1981—2003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7193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电话:(029) 88493844 88491575

网址:www.nwpup.com

印刷者:陕西宝石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 mm×960 mm 1/16

印张:11.625

字数:248千字

版次: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00元

前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整个学术界都开始在与外来思想的接触与交流中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期。作为交流媒介的翻译自然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而此时,中国翻译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从历史的分期看,无疑是属于当代,而从理论追求和理论研究的性质来看,又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因此,本书姑且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个处于当代的现代理论的建设阶段称为中国翻译研究的“新时期”。

中国翻译研究“新时期”之“新”有丰富的含义。从学术环境而言,它意味着一个全面向外学习和多学科交流互动的时代,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从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在转变和革新的过程,此外,研究队伍也在力量和成分上都有新的发展。诸如此类诸多的“新”中,包括了新的成就,也包括了新的问题。总之,这是一个需要用新的视角来考察的新阶段。

几年前,作为中国翻译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人”,我要做的,首先是在了解过去的基础上认识它的现在。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我颇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个时期的成果用硕果累累来形容犹嫌不足,因为学术专著和论文的数量逐年都在以数倍的速度增加。但是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在世纪之交及本世纪之初,又出现了不少声音对这种蓬勃发展的局势表示出了一些忧虑和思索。究竟是真的繁荣?还是表面的繁荣?抑或繁荣与问题并存?这是我迫切想知道的问题,也成了我进行这项研究的动机。

在收集到上百本重要专著和上千篇论文之后,面对庞杂的资料,颇有无法下手之感。后来经过进一步的阅读和整理,终于从中选出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为研究重点,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至少能找到对我而言有操作性的切入点了。对这些代表性成果进行分析之后,我确定了本书的研究思路,即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本书考察的是中国翻译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整体状况,选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对它们的考察来反映整体的发展情况。整体是具体成果反映出的整体,对具体成果的考察又是置于整体的背景和环境之下。这便是整体与局部相结合,以便于全局性与实证性两者都有所顾及。由外而内指的是本书首先考察的是

中国翻译研究的外来资源与本土的传统资源,然后才是对新时期翻译研究本身做出考察,最终以中国翻译学科的建设问题作为终结,希望以此能将诸多的影响因素都包括进来,尽量做到客观、全面地分析各种变化与发展。

本书共分为九章。除了第一章绪论交代了研究目标与思路之外,其余八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二章与第三章,首先介绍了西方翻译理论引进的各种情况,以反映出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发展的外在资源,这种外在资源由外及内、较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路向和性质。接下来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问题做了考察,反映出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对待传统译论的态度上所发生的转变、以及对传统译论继承方式上的变化,并对继承的途径做了预测和展望。中国传统译论显然并不止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它明显地在中国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路线中得到传承,并且在 21 世纪初关于引进与原创、西化与本土化的反思中被赋予新的意义。第二部分为第四、五、六章。这三章分别分析了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中的几种重要研究模式、各模式的渊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整体多元局势。通过对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语言学模式、文化模式、文艺学模式是当前中国翻译研究中三种重要的模式,但三者的影响力并非平分秋色,其力量对比和关系在逐渐发生变化。这是对中国现阶段翻译研究整体状态的一种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反映。其余的三章为第三部分,主要考察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伴随着翻译学科的逐渐壮大,各种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出现,因此,这一部分首先分析的就是新时期中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着的观念和认识上的冲突,以四次大辩论为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接下来对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考察,包括对重要的翻译学论著进行分析,对翻译学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做出考察等,从与学科建设本身相关的讨论和学科领域内的实际成果两方面来反映中国翻译学的成长过程。最后一章从整体上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以此来凸显出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现有成就与将来发展可资依凭的学术基础以及在 2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这一章同时也是全书的结论部分,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和反思。

近年来在国内几次以翻译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上,都听到有学者提出类似于“中国翻译研究的状况现状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听说有国外的刊物向国内的研究者约稿,希望能了解中国的翻译研究情况。有关方面的研究也的确不少,但涵盖面广、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却仍然有所欠缺。这项研究当然有其不可忽视的难点,对我而言,尤其是在做评论和分析之时,时有踟蹰与困惑之感,幸而这项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我对它的兴趣最终促成了它的完成。然而,作为一名翻译研究中的“新人”,本书的缺陷自然在所难免,希望对此有兴趣的研究者能够不吝赐教!

李林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阶段性考察:现代翻译研究发展的需要	1
1.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4
1.3 本书的研究目标与方法	7
1.4 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发展概述	10
第二章 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	16
2.1 1981—1996 年:引进的初始期	16
2.1.1 引进的内容	16
2.1.2 引进的背景	19
2.1.3 引进的意义	19
2.1.4 引进的方式	20
2.2 1997—2003 年:引进的拓展期	22
2.2.1 引进的内容	22
2.2.2 引进的背景	23
2.2.3 引进的意义	24
2.2.4 引进的方式	25
2.3 西译论引进的评价与总结	26
2.3.1 引进的成绩与问题	26
2.3.2 西译论引进——理论发展的必然	28
第三章 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与继承	31
3.1 中国传统译论的批判性研究	32
3.2 在诠释中继承中国传统译论	35
3.3 整合创新——让传统走进现代	38

第四章 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路线	41
4.1 中国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模式的发端	41
4.2 语言学模式的发展和调整	44
4.2.1 转换生成模式	45
4.2.2 语义模式	46
4.2.3 语篇模式	50
4.2.4 语用模式	53
4.3 语言学模式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55
第五章 中国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路线	58
5.1 中国传统文艺学翻译研究的集成者——许渊冲	59
5.2 神似翻译理论研究的总结——《神似翻译学》	60
5.3 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翻译研究的奠基者——张今	62
5.4 中国文艺学派翻译学的构建——《文学翻译学》	64
5.5 结语:文艺学派,不应只是传统	67
第六章 中国翻译研究的多元共生局面	69
6.1 文化模式翻译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69
6.2 各种层面哲学模式翻译研究的开发	72
6.3 中国翻译研究多元局势的形成	74
6.4 多元模式的共处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76
6.4.1 译学范式研究	76
6.4.2 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	78
第七章 在冲突中发展的中国翻译研究	81
7.1 科学与艺术之争	82
7.2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辩	85
7.3 翻译学之成立与不成立、特色派与共性派之争	88
7.3.1 翻译学之成立与不成立之辩	88
7.3.2 翻译学之特色派与共性派之辩	91
7.4 归化与异化之争	93
7.5 另一种形式的冲突——新旧观念的革新	97
7.5.1 翻译忠实观的解构	97
7.5.2 冲破全译观之统治的变译理论	99

第八章 中国翻译学的成长	102
8.1 “翻译学”辨义	102
8.1.1 “翻译学”术语的运用	102
8.1.2 “翻译学”著作的撰写问题	103
8.2 翻译学著作评述	105
8.2.1 翻译学的尝试性著作——黄龙的《翻译学》	105
8.2.2 翻译家的译学研究——彭卓吾论翻译学	106
8.2.3 翻译学建设走向成熟——谭载喜的《翻译学》	108
8.3 翻译学建设焦点问题	110
8.3.1 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探讨	110
8.3.2 翻译学学科性质研究	112
8.3.3 翻译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14
8.3.4 翻译学建立起来了么?	116
第九章 结论	119
9.1 中国翻译研究的成就与发展的动力	119
9.2 中国翻译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123
附录	129
附录 A 翻译类书目选录	129
附录 B 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类论文题目选录	139
附录 C 西译论译介类论著题目选录	155
附录 D 翻译学类论文题目选录	164
参考文献	170
致谢	177

第一章 绪 论

1.1 阶段性考察：现代翻译研究发展的需要

中国翻译研究发展至今，虽然并没有泾渭分明的阶段性分界线，况且人文学科的发展其延续性和继承性是内在的、无法隔断的，但是，本书选择 1981 年作为研究的肇始年份，是因为它相对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而 2003 年作为终止年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研究时代的局限，因为这个年份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然而身处此时的笔者，只能从此断开，以 1981—2003 年作为一个研究的阶段。本书研究的是从 1981—2003 年期间中国翻译研究的总体状况，主要基于这一阶段内发表于中国大陆的翻译研究文献，包括具有重要意义著作和论文，以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事件。同时，对产生于 1981 年以前及 2003 年以后的少量重要文献和学术事件也有论及。在内容上侧重于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考察，主要论题包括我国翻译界在西方译论引进、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多元局势、重要的论辩以及翻译学科建设方面的基本事实和发展状况。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态开始有了转变。在此之前的翻译理论，远至基于佛经翻译实践的译论，近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译论，从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及理论形态上基本都可以归属为传统译论类。对于中国新时期的划分，较为普遍的做法是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为上限，但这种划分方法显然不能显示出翻译研究本身发展的特点和阶段性。我国从 1981 年开始引进西方翻译理论^①，才逐渐唤起了译界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观念，此后经过几年对西方译论学习，它们的影响开始体现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中。从此之后，我国的翻译研究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等方面和整体态势上开始发生逐渐的转变，这个变化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就更加明显。因此，选择 1981 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份，是因为它大致可以算作一个新的理论研究阶段的开始，由此可确定中

^① 1981 年，《国外语言学》第 2 期刊登了林书武教授的《奈达的翻译理论简介》，开始了奈达理论在中国的译介。1982 年，卡特福德、巴尔胡达罗夫、纽马克等学者的翻译理论陆续得到了译介，此后，国外翻译理论译介的数量逐年增加，其中以介绍奈达理论的文章最多。从 1982 年开始，出现了讨论翻译等值的文章，从 1983 年开始，出现了数篇用乔姆斯基的理论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此后，西方译论和语言学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影响逐渐加大。

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历史起点和肇始意义。

(2) 这个阶段的翻译研究是在前所未有的学科交融和外来理论的冲击和影响下进行的,其学术环境较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是历史上任何阶段的翻译研究都未曾经历过的。不仅有各种西方译论在影响和冲击着中国的翻译研究,同时其他学科的发展也对它产生着影响。如果说以往的翻译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框架和体系内进行,那么这个阶段的译论则是在一个和西方翻译理论不断接触(早期尚未达到互动)和多学科借鉴的环境下发展的,带有越来越浓厚的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和理论探索的特征,这就赋予它特殊的时代特征和学术意义。

(3) 翻译研究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翻译学学科建设作为目标确定了下来。这是这个阶段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这个目标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进行的论辩,都是前所未有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译论为现代译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材料,但从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来看,这个阶段以前的所有努力都是积累性的工作。只有从这个阶段开始,学科建设才作为一个切实的目标,开始进入了真正的翻译学科建设史。相应地,学位建设和翻译教学方面的发展也获得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强力支撑和有利氛围。从这一点来说,本书的研究也将为翻译学学科建设做一定的论证和基础性工作。

(4) 最后一个将笔者引向这个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和此前近 2000 年的传统译论史相比,这短短的 20 余载从时间上来说未若弹指一挥,然而在这个阶段的翻译研究中,不但论著的数量非常可观^①,而且从所产生的理论的内容上来看,其丰富性更是传统译论无可比拟的。然而尽管这个阶段的成绩异彩纷呈,至今却没有一个总体、系统的研究来说明这些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遗漏了什么问题;经验是什么,教训又是什么。译界有不少人对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成果评价不高,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杨晓荣教授指出,我们对国内 20 多年来的成果重视不够,谈起我们的研究,“要么就是一谈起来只说毛病,要么就是除了有数的几个权威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还有的是根本就没有认真去查阅、了解。”^②这种批评是较为中肯的,中国译界的确需要有一个基于事实调查基础上全面的研究,本项研究的性质与目标便因此而确定下来。

此外,与之前的研究状况相比,这个阶段也需要一个整体上的研究。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

^① 郭建中《中国翻译界十年(1987—1997):回顾与展望》,《外国语》,1999(6):53-60 引用黄任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间,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翻译论文 1.4 万多篇,有关翻译专著 500 部,论文集 20 余部。(黄任,《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华东地区第四次翻译研讨会论文,1998)

据杨自俭《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中国翻译》,2002(1):4-10 统计:翻译教材和翻译论著的出版情况为,20 世纪 80 年代共 204 种,90 年代增加到 268 种。

据笔者的初步统计,1981—2003 年的 23 年中,各种刊物所刊登的翻译类论文 2 万多篇,史类著作 20 多种,论文集大约 50 种,各种教材 200 多种,专著 600 多种。

^② 杨晓荣,略论我国翻译研究中为什么没有流派,《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39-42,42。

传统译论研究各时期及总体的状况。述其要者，有侧重于“史”的陈福康教授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孙致礼教授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王建开博士对《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的研究，以及2004年9月出版的谢天振、查明建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等，对传统翻译研究及翻译事件做了文献上的梳理，对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描绘。有侧重于“论”的王克非教授的《翻译文化史论》，王秉钦教授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侧重于80年代前的译论），王宏印教授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等，它们都对传统译论的渊源与思想做了挖掘与梳理。虽然这些研究也是在中国新时期这一阶段之内进行的，但将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本身作为一个课题，这样的研究却仍然比较零散，资料缺乏整合，甚至没有成为一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或许部分的原因在于这项研究所具有的几个不容忽视的难点：①资料庞杂。收集、归类和分析需要很大的工作量，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或无暇涉足的原因之一。②对翻译成果做分类的或总体的评价不易，因为中国翻译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变化和相对不稳定的局势之中，这对评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也构成相当大的挑战。③这20多年虽然在时间上已成过去，但是在事件在性质上却仍属于现在，和研究者所处的时间不能拉开距离，因此，不容易找到一个超脱的观照视角。此外，对于笔者而言，除了上述客观因素，这项研究所需的理论辨识能力和宏观统筹的视野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杨晓荣教授在1996年曾说：“面对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这样一个时期，翻译界可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对前一阶段的研究加以整理，弄清哪些是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哪些是还存有疑问、需要继续探讨的；哪些是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目前研究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对现有成果做出评价等等。此外，对介绍、引进国外翻译理论的情况也应予以整理，以促进其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① 至今10年已过，期间，上述各部分工作虽然都有所进展，但对不同领域内的翻译研究进行考察即便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并不意味着总体的研究已成一定规模，甚至都不能代表总体研究已经开始。因此，我们事实上仍然缺乏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考察。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内分别做的研究与置于总体统筹之下对各领域进行考察，其意义是不同的。原因在于各领域内的翻译研究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例如西译论的引进对我国译论发展的影响，再如各种研究模式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相互之间的认识和评价等等。这些只有置于一个全局性的背景之下，才更容易发现彼此之间的联系，反映出整体的成就，同时显示出仍然存在的不足、疏漏与问题等。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能由一个人一步就完成，但需要有一个人的研究作为开始，那么，笔者的研究与以前及以后的研究都将会成为这项庞大的工作的一个个组成部分。

要对中国新时期的翻译研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需要面对庞杂的资料与复杂的甚至有些纷繁的现状，对之做有条理的梳理。为了使梳理与评述的工作体现出层次性与条理性，本书将翻译研究中的不同领域作为不同的研究点，逐个考察。首先，将西方译论的引进作为第一

① 杨晓荣，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中国翻译》，1996（6）：8-11，11。

个研究点,因为它是中国翻译研究走向现代化的直接影响力,也是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外部环境。之后,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状况进行考察,因为它是中国现代译论发展的一个起点,同时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是建设现代译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样,就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外来影响与内部资源都予以了关注。在内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翻译研究在这20多年间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尤其是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发端到90年代后期及近几年的发展与调整,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支最重要力量,因此也构成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与中国传统译论一脉相承的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并且随着中国传统译论的价值重新得到重视,它有望在新世纪里发展壮大起来,对这种模式的状况也应做一个较为细致的研究。此外,近几年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是中国译坛一支新兴的力量,发展势头非常可观。它与语言学模式、文艺学模式的翻译研究,以及哲学模式和其他模式的翻译研究共存,形成了我国现在翻译研究的多元局面。掌握了这一个大致的全景之后,有必要对中国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即这20多年来4次重大的论辩以及一些新旧翻译观念的冲突。它们一方面是新时期中国译坛发展中的重要现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内部动力。以上各种具体的研究都和一个主题相关,即中国翻译学的建设问题。虽然号召与倡导的力度与多寡对翻译学的建设有所影响,但是在根本意义上,翻译学的建设与成就不取决于此,而是基于各种理论的发展成熟。因此,以上各个研究点虽然没有直接置于翻译学建设的框架之中,却和它密切相关。此外,对与翻译学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如学科体系、学科性质等方面也都应做出考察。以上种种研究,彼此间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总之,本书要对这20余年中我国翻译研究的成果做出梳理,摸清事实,知其所为,并进一步探其原因。同时,鉴往以知今,知今以预后。我国过去在翻译理论建设之路上的探索和发展的经验,对理论建设的下一步计划和发展方向应该有所启示。

1.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发展至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各种西方译论接踵而至,国内论著纷涌迭出,翻译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展开和深入。虽然国内至今尚没有人对这段时期的翻译成果从整体上做出全局性的实证性考察和总结,但在这20多年中,已有不同的研究者对某个领域或者此间某个阶段的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回顾和梳理。目前已有的可以视做总结性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

(1) 文献综述与论文集

译界每年都会有一批新的成果,因此对当年的重要成果做及时的回顾和描述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从1995年至今,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等刊物上几乎每年都会刊登上一年的翻译研究情况综述,林璋、穆雷等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值得肯定的贡献。此外,1987年首届青岛翻译研讨会之后,译界至今已召开60余次关于翻译的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上都

有有价值的论文产生,会后的会议综述对会议主题和会上主要观点进行的描述和总结,能及时反映译界动态。这两类综述的贡献在于能够把译界的最新成果和动态及时整理、介绍出来,具有较强的资讯性,包含的信息量较大。局限性在于重在观点列举而不能反映观点之间的前后联系和总体面貌,同时这种列举法只能有重点地选择所有成果中的一小部分加以简略介绍,因此难免有所偏漏。

另一类集中反映翻译研究成果的方式是论文或者资料的汇总和编纂。论文集的编写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研究的成分在内,但是,对文献的挑选和整理一方面要经过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过去的文献是将来的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必备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出版的论文集已有60册左右。罗新璋先生所编《翻译论集》与《翻译通讯》编辑部所编《翻译研究论文集》基本上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重要文献,它们的编写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捷途径。杨自俭教授所编《翻译新论(1983—1992)》(1994)收集论文48篇,专著节选6篇,是在10年的庞杂文献中挑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意义的文献。此外,杨自俭、李瑞华两位教授所编《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以及杨自俭其后所编的几本《英汉语比较与翻译》,汇集了几次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会议论文。此后,杨自俭主编的《译学新探》(2002)以及张柏然、许钧教授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2002)等论文集则汇集了译学探索方面的前沿性、代表性研究成果。在文学翻译方面,许钧教授所编《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1996)论文集反映了关于《红与黑》翻译上的观点和问题。南开大学2002年主办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其《〈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也于2004年底出版,汇聚了《红楼梦》翻译的各种课题和研究。其他会议也大多在会后编辑了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与会议议题有关领域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此外,由罗选民教授主编的《中华翻译文摘》已经出版了2001年、2002年等几卷,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介绍了当年中国、包括港台的重要译学成果。孙迎春教授主编的《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2001)与《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2003)中则将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术语进行了汇总和编纂,与方梦之教授编写的《译学词典》(2004)共同为中国翻译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库。以上这些研究能够用很经济的方式反映某个领域内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让其他研究者能够在较短时期内集中了解该领域相关成果,是研究者们宝贵的文献库,也是本研究可资借用的有用资源。

(2) 对专门领域的研究

具体的翻译研究是在不同的层面展开的,有一些研究者对这些专门领域内的研究状况做了较系统的评述和总结。其中,对翻译教学领域内的总结性研究较为显著。1999年和2001年先后出版了穆雷和张美芳的专著。穆雷教授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①回顾了中国翻译教学的历史,并对中国翻译教学各方面的现状做了考察和分析,反映了我国翻译教学各个层面及全局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目标。这项研究资料全面,分类详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96—1998年度青年项目。

尽,总结也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张美芳教授所著的《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正如书名显示,重点在于对翻译教材的研究。作者对我国大陆已经出版的翻译教材做了归类,并从115种教材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12种进行重点研究,尤其注重对教材中理论部分的考察。这项研究中所采用的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这两本专著还有一个共同的贡献就是书后附有详尽的分类附录,这些附录将成为宝贵的资料库,便于后来的研究者查找和索引。这两本著作对我国翻译教学领域的现状做了全面的实证性研究,反映了这个领域内的发展情况,同时也规划了日后的发展方向。相比之下,在其他领域内目前尚未展开如此详尽和大规模的整体性研究。

在翻译批评领域,有周仪和罗平编著的《翻译与批评》一书。两位教授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所做的研究既包括对国内学者观点的引述,也融入了自己的观点和评论。这本书在部分章节中集中讨论了批评界共同关注的几个问题,既有对其他学者的观点的引证,也有作者的评论和思考。其中第二章第五节回顾了国内近20年来的翻译批评现状,部分反映了这个领域内的大致情况。沈苏儒先生著有《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这本著作基本上涵盖了“信达雅”理论产生以来,翻译界百年内关于信达雅讨论的所有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了清晰的分类和评价,基本上反映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具有较高资料性价值和总结性意义。就在笔者的研究即将结束的时候,喜见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2005)一书出版。她对翻译批评方面,尤其是翻译标准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梳理和思考,使翻译批评成为一个突出的专门研究领域,而杨晓荣近几年对翻译批评的研究也不断为这个领域增添新的研究成果。而就在2006年,王宏印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问世,再一次将翻译批评这个长期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的领域在理论上得到了提升,从而使翻译批评的系统性得以增强。

在其他领域内,也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对翻译研究作出分析和总评。成果较为显著的有对翻译学科建设做出回顾和对其发展历程做出梳理的一批论文,它们总结出了以往的经验,也反映了不足。在西译论译介方面,陈宏薇教授对奈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分析,统计了国内发表的与奈达理论有关的大量文章,从对奈达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吸收过程中总结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进步和不足^①。穆雷教授对国内出版的全部翻译史类著作和关于翻译家的研究也做出了成果回顾和总结。许均和王克非教授对1989—1996年国内立项的8个主要研究课题做了评述,等等。这些都是对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回顾和总结。

总体而言,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因其研究领域相对较专而对研究对象进行的集中讨论,不但能横向总揽,而且也能纵深挖掘。因此,它们构成了译学建设阶段性总结和反思工作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具有奠基性和引导性的作用。

(3) 全局性的评判和总结

此外,还有一类专著和论文可视为总结性的研究。这些论著的作者对我国过去的翻译研

^① 陈宏薇,从“奈达现象”看中国翻译研究走向成熟,《中国翻译》,2001(6):46-49。

究状况虽然了解,但是在研究成果中并不做资料上的梳理,而是越过文献考证,直接进行整体上的评价和总结。这一类研究者大多都是活跃在译坛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我国以往的翻译研究所做的高瞻远瞩的反思和批判对其他研究者可以起到指引和借鉴的作用,也能从整体上反映出我国译坛的现状。例如,一直走在我国译学建设道路前沿的杨自俭教授在多篇文中都对当前译学建设中的现象和理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对以往的研究做出整体上的评价。再如杨晓荣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状况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批判性总结,指出了我国翻译理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了我国翻译研究没有形成流派的原因,等等。此外还有傅勇林、张柏然、黄忠廉、王东风、辜正坤等多位学者从整体上反观和评价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指出问题,总结经验。尽管各位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基本上都认为我国译界在过去的20多年间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体现在译学建设、理论形态、研究课题等各个方面。他们也都认为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研究方法还不够科学,理论探讨不够深入,西方译论引进后和中国翻译研究没有很好地结合,等等。这些总结与评估对我国的翻译研究能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这类文章在整体评价和总结的基础上也对我国翻译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向做出了设想和规划,起到一些指引方向与宏观调控的作用。尽管有些文章中个别观点的合理性和确切性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但这类研究的高度概括力与批判性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能够起到鉴往知今的作用。

事实上,国内现有一本试图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做阶段划分和总结的专著,即吕俊教授的《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作者的哲学功底、理论意识和对翻译的独到认识赋予了这本著作以理论深度和创新性。作者认为我国过去的20年中的翻译研究从语文学研究模式中走了出来,并依次进入结构主义模式阶段和解构主义模式阶段,现在应该进入建构主义模式的建设。作者对于理论的沿革有很清晰的认识,不过从整个论证过程来看,这并不是针对于我国的翻译研究实际情况所做的总结,而是对翻译研究模式本身,尤其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模式所做的研究。因此它的意义在于对翻译研究模式的理论探讨,而不在于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做出评价和总结。

以上三类研究各有侧重,各有所长,或聚焦于“木”,或勾勒出“林”。微观实证的研究体现不出整体上的联系和总体局势,宏观概括的研究道出了其“所以然”而不说明其“然”。但是,它们都构成了总体性研究的基础,提供了直接资源,同时本身也是总体性研究的研究对象。本书将吸取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做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梳理与总结。

1.3 本书的研究目标与方法

在本书中,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考察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1) 在整体上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基本事实和现状全景进行描绘和考察。

这一阶段在时间上已经有了20多年,在成果上也数量可观。这种考察虽然不可能照顾

到所有的方面,但对主要层面和领域的情况都力图有基本的把握,尽量反映出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以及在总体上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

(2) 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过程做阶段性总结。

这一历时 20 余年的阶段本身是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历程。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存在不同的问题,并大致显示出了一定的阶段性。本书将根据这种特征做出基本的阶段划分,对各个阶段做分别的描述和总结,并让其贯通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

(3) 对中国翻译研究的领域和理论研究的模式进行分类和评判。

中国翻译研究是一个总称,在它之下是各个领域的研究,不同的研究所基于的理论基础和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因此,这个研究试图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模式做基本的划分,同时反映出不同领域内的研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各领域内的学术成果和发展历程做出基本的尝试性评价。

以上三个目标是互相联系的。全局意识和整体观统筹着整个研究,在此之下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进行分类和阶段划分,便于把握各个具体研究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对整体进行基本的分类和分期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细致的考察,进行基本的评价,从而实现以下三个预期的目标:

1) 通过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做出全景式的描写性研究,在实证性考察的基础上反映出中国现代翻译研究的全局状况和研究格局的基本态势与发展趋向。

2) 通过对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进行研究领域和研究模式的划分,体现出各领域内的发展状况,并对各种研究做出基本的阶段梳理,理清发展的轨迹。

3) 凸显和总结出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中重大成果的学术地位和理论意义,同时揭示和总结各个层面及整体上仍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中国翻译学的日后发展做基础性的贡献。

针对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时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研究将主要运用以下几种方法:

(1) 文献描述法

本书要对 1981—2003 年期间译界重要的专著和论文等文献做出以理论分析为主的分析和考察,一切评论和判断都以对基本事实和资料的统计和调查为客观依据,避免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断和推论,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实证性质。从 1981—2003 年这 23 年间,中国翻译研究成果累累,数百本专著和上万篇论文就是主要研究范围。从中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几十本专著和上百篇论文,对它们进行实证性的考察,对其理论形态和地位、作用进行描述,这是本书最基础的研究方法。这里重要的是要使所挑选的文献具有代表性,描述也要尽量做到客观、有效。对文献做一个整体的全局考察是必要的,但进入重点研究范围的只能是有代表性的相对少数。它们在研究方法、理论形态、历史作用或创新性、争议性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能够代表某一类文献,因此,对它们做梳理和考察就是对一类文献进行梳理和考察,这样既能保证论述的凝练,也对重大问题不会遗漏。文献描述不是文献的观点罗列,而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①文献总体思想的提炼。对文献的主旨和要义要有宏观的把握,并透过文

字领会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②重要观点的提取。每一个文献都包含不止一条观点，这些观点有主次之分，对它们都一一罗列既没必要，也没有意义，而且还影响文献主要观点的体现，因此，抓住主要观点进行描述，才能保证描述的有效性。此外，描述不是简单地复述原文献的观点，除了在必要之处引述原文，大多情况下都要将重要观点和核心思想提炼出来，变为适合学术写作的凝练语言。

（2）历史研究法

在严格的意义上，本书研究的这个阶段不能算作一段历史，一则时间跨度短，二则和现在没有拉开距离。但在本书的研究中，将会用到历史研究法中的材料归纳法和阶段划分法，并探讨事件的发生环境、背景和事件之间的联系。20多年是一个整体，但这个过程体现出了变化和发展，不同的时间段大致能呈现出有别于其他阶段的特征。对这样的发展过程做基本的阶段划分是必要的研究方法，这样可以显示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凸显各个阶段的特点，也更便于体现出发展的成果。同时，对属于同样性质的材料进行归类，便于集中考察。但在这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每一项或每一类成果都不是独立的，它们与前面的研究以及与后来的研究之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且，将它们置于一个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每一单独的成果都体现为这个整体的有机部分。因此，对单独成果的考察必须和成果之间联系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反映出整体研究和专门领域的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及各领域研究之间的关系、成果与成果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使这个研究体现出整体观、联系观、发展观，总的来说，也就是历史观。

（3）理论评判法

评判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对理论发展的成绩与问题以及研究成果的地位做出基本的判断，这也是使本项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途径。文献的筛选、研究模式的辨别和阶段划分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理论的评判，凡是进入研究重点的文献都要经过意义和价值上的评判，对研究类别和研究阶段的划分更要求在落实到文字之前就进行一种评判性的工作。具体反映在本书的文字表述上，则体现为对研究成果、研究模式、研究阶段的评价，对各类研究之间的联系在考察基础上进行的论证，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评判，对有争议的问题的基本判断等等。这样，这个研究不但力图反映事实层面的状况，也尽量对事实的意义、作用、与其他事实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较深层次的思考，因此，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单纯翻译成果史，而是对这些成果做出学术性的考察和评价。

除了以上主要方法之外，本书还将用到统计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以上各种方法应该是融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文献描述和理论评判相结合，有述有论，述、论结合，同时，保证一种整体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统摄全局。因此，这个研究不仅分析单个的事件和过去的、局部的情况，更要进而对事件间的联系作出推理，并从过去知现在，从局部知全体，将诸多现象一并考察，逐渐达成总体结论。